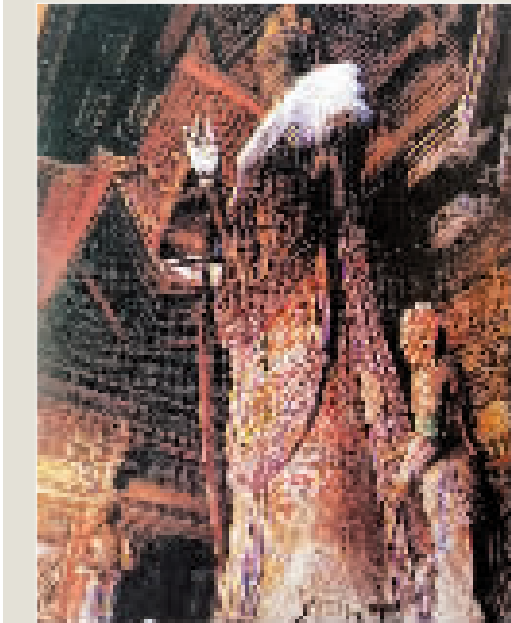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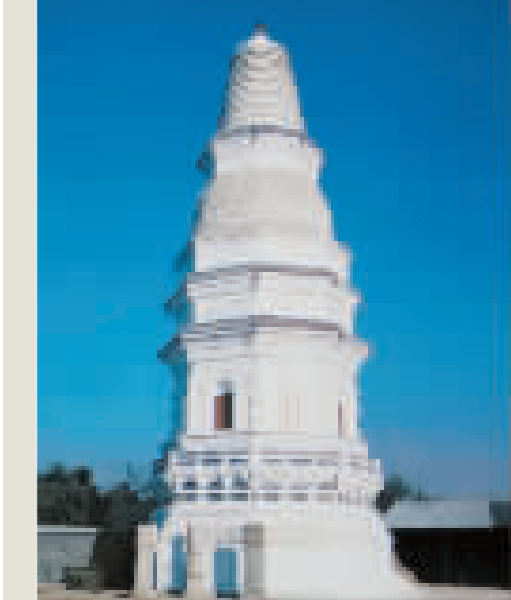
张明山泥塑《渔樵问答》



马顺清砖雕《龙凤》



独乐寺十一面观音



辽代蓟州白塔

工艺美术是城市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城市发展的精神动力。天津「郡新而地古」,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铸就了天津独特的历史特点和文化内涵。千百年来,天津工艺美术赋予了城市活力,激发了人们对美的追求。

古代天津(1840年前)——

从先秦到晚清,天津地域的工艺美术发展多有朝代特色

天津得名虽在明朝初年,但地域历史悠久,文化艺术源远流长。新中国成立后,文物考古部门在全市范围内进行多次普查、发掘,所获取的大量资料表明,早在原始社会,天津地域即已出现雕塑和彩绘艺术。商周时代的青铜纹饰、金文,反映出天津地域文化艺术历史的悠久和内涵的丰富,以及先民的聪明才智和审美情趣。夏末至商前期的彩绘陶,商末周初的青铜纹饰,西周中期饰有凤鸟纹或饕餮纹的青铜礼器,战国时期刻绘有鱼、鸟动物纹和山形纹的陶壶及兽纹瓦当……从这些出土的器物可以看出,先秦时期天津地域内的工艺美术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自西汉开始,天津平原区域被纳入我国郡县制行政体制,在海河南北分别建立了东平舒县和泉州县,天津在新生的封建制度下得到迅速发展。西汉晚期,天津平原区域发生一次海侵,东汉末年海河水系形成。汉代的画像石、碑刻,北魏时的铜造像,唐代的摩崖石刻、陶乐俑等反映了西汉至唐代的经济、人文意识和工艺美术的发展状况。

北宋辽金时期,天津地区的雕塑工艺等尤为出色。海河是北宋与辽的界河。海河以北,辽政权以幽蓟地区为农业基地,生产稳定,经济充实,契丹贵族在此修建了许多大型佛教建筑。遗存于今武清区、宝坻区、蓟州区的寺院和佛塔,展现了当时雕塑工艺之精美。渔阳县(今蓟州区)重建的白塔,八角形基座上砖雕一周壶门,内镶乐舞伎图案砖雕,乐舞伎或手挥彩带翩然起舞,或弹奏琵琶、箏,或吹笙、笛、笙簧,或击拍板、方响、毛员鼓、都昙鼓。壶门上有砖雕斗拱和双重栏杆,栏板上雕宝相花和几何形图案。独乐寺重建后,观音阁内十一面观音像,胁侍菩萨像和山门内力士像均重新彩塑。石刻经幢出现在今宝坻区。幢座底部方台基四面雕佛经故事。台上置须弥座,束腰处刻壶门,内雕有佛像。

辽和北宋政权灭亡,海河南北一并进入金朝的版图。皇统年间在宝坻广济寺(建于辽)修建的石经幢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价值。

县城北台是一处规模颇大的辽金时期墓地,近年曾在此发现六角砖室墓,以及用石函作葬具的墓葬,出土有“金三彩”等许多珍贵文物。元朝定都北京后,其军需民食均取自江南,漕运繁忙,又增加了海运。延祐三年(1316)改直沽寨为“海津镇”,由重兵驻守。随着漕运和盐业的发展,南北通商,贸易兴旺,促进了文化艺术的交流,并传来闽浙一带的“妈祖文化”。坐落在三岔河口附近的天妃宫便创建于元代(后称天后宫,俗

称“娘娘宫”)。从天后宫大殿梁架的勘察看,现有的大殿不仅是天津市区最古老的建筑实例,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天妃、妈祖庙之一。元代,在今天津市宝坻区出了一位鼎鼎大名的“雕塑奇人”刘元。刘元从事雕塑艺术近半个世纪之久。在中国雕塑史上,他自成一派,世称“刘奎法式”或“刘奎塑”。当时人们称他为塑像奇才,后世认为他的作品都是绝代精品。

明永乐二年(1404),天津因明成祖朱棣经过而得名。1952年,天津南门外曾出土一块《重修三官庙碑》,碑文上刻有“我祖天皇帝入靖内难,圣驾由此济渡沧州,因赐名天津”字样,并设卫筑城。正统元年(1436),卫学出现,自此,天津城市和文化艺术发展进入新阶段。万历年间,津西杨柳青镇出现民间艺人用手绘制的年画。崇祯年间,出现了印制杨柳青年画的作坊。崇祯十二年(1639)出现了套色印刷。

杨柳青年画,全称“杨柳青木板年画”,属于木版印制品,是著名的中国民间木版年画之一。天津杨柳青继承了宋、元绘画的传统,吸收了明代木刻版画、工艺美术、戏剧舞台的形式,采用木版套印和手工彩绘相结合的方法,创立了鲜明活泼、喜气吉祥、富有感人题材的独特风格。2006年5月20日,该遗产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清代早中期的天津工艺美术逐渐走向兴旺。特殊的地理环境、漕运的兴盛,以盐业为一大支柱的沿海经济及临近京都的地位,进一步推进了这里工艺美术的创制。特别是盐商构建私家园林,延纳南北文人学者,进行诗、书、画创作,同时促进了工艺美术的交流与构筑。清乾隆年间是杨柳青年画的兴盛时期。著名的作坊画店有:戴廉增画店、齐健隆画店。此外还有“美丽”“廉增丽”“盛兴”“爱竹斋”“宪章”“高庆云”等画店相继开业。当时,杨柳青镇周围有30多个村庄从事年画创作和生产。这个时期,以盐业、漕船起家的“八大家”等富商豪门陆续建造豪华宅第,木雕、砖雕等作为建筑装饰艺术,雕刻细腻,工艺高超,成为天津工艺美术的重要类别,并涌现出多位雕刻高手。天津的民间工艺美术与同时代其他地方相比较,已明显形成自己独特的地方风格。

回顾这段时期,虽然天津地域是从明代开始设卫筑城,但可以看出从夏朝甚至更早的时期开始,天津平原一带已开始工艺美术的多样化创作。随着地理位置在历朝各代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天津地域的工艺美术既吸收了南北各地的文化特色和优势,又持续构建出本地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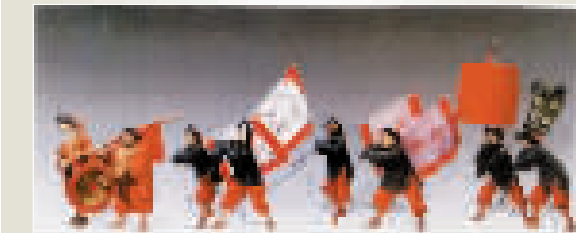
郡新地古 多彩精致

——简述天津工艺美术的创意与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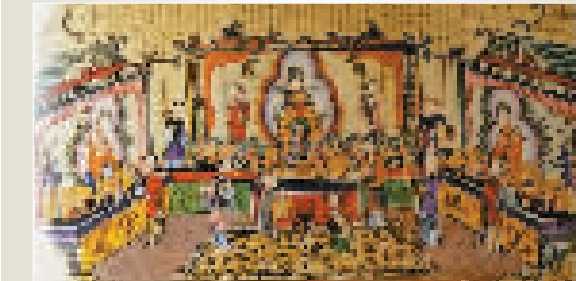
章用秀



魏元泰在制作风箏



张玉亭泥塑《钟馗嫁妹》(局部)



杨柳青年画《大姐拴娃娃》(晚清)

近现代天津(1840—1949)——

融合中西文化,大批的工艺美术匠人和作坊诞生

清咸丰十年(1860),天津被迫开埠通商,英、法、美、日、德、俄、比、意、奥九国先后在天津设立租界,西方的宗教、文化也渗透进来。加之国内洋务派推行“师夷长技”,天津遂成为北方洋务运动的中心,在经济上发展成为沟通中外的工商业发达的大都市。在文化艺术上受到洋务文化的影响,开中西文化融合之先河。此时的天津工艺美术在继承明清时期产生的杨柳青木板年画和木雕、刻砖等基础上,出现了“泥人张”彩塑、魏记风箏、“刻砖刘”、“木雕刘”,以及面塑、彩灯等更多领域的优秀代表。杨柳青木版水印花年画也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在中国木版年画史上与著名的苏州桃花坞年画并称为“南桃北柳”。

天津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先后推行洋务新政和北洋新政,提倡自强自立,实业救国。清光绪年间,直隶工艺总局设立工艺学堂和实习工场,教授国画、刺绣、提花等科目,成为成批生产工艺美术产品的开端。建于1902年的劝业陈列所以“启迪民智、振兴工商”为宗旨,公开展示机械制造、文教用品、机织印染、工艺美术等本地及外地产品。并对展品进行考评,凡得分最多、独出心裁、创造新颖、能行销国外,且道德与名誉上佳者,皆授予金质奖牌。展示和考评的物品就包括来自民间的工艺美术佳品。这种带有现代意义的举措促进了地毯、瓷艺、剪纸及其他工艺制作的兴旺。

天津地毯素以做工精细、图案优美、配色协调、质地坚韧、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和精湛手工技艺而驰名中外。天津地毯的织作技艺

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北京传入的。“义盛公”是天津的第一家地毯作坊。此后,“义聚恒”“庆生恒”“三顺永”“玉盛永”“协立永”等地毯厂先后成立。当时,天津地毯业有工场、作坊13家,织机近400架。

天津剪纸艺术以“剪纸纸”为代表,借鉴了年画、瓷器和木雕图案,吸收了皮影戏的彩绘艺术,以写意手法,刻画人物、花鸟和图案,把民间手工艺制作推向了艺术创作的高度。

绒绢花即用丝绒或绢制作的花鸟工艺品。至20世纪初时,在天津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它的产生和发展,与天津的民俗生活密切相关。近代,做绒绢花的艺人,以人称“花儿刘”的武清县(今武清区)刘亨元的作品最为驰名,其作品曾在巴拿马世界博览会上获奖。

通草堆画是一种传统手工艺品。以中草药的通草为原料,以素堆法为主,经过匠心构思、设计、制图、试制、切片加工成通片,精心雕刻成形,绘画组装成堆画。通草堆画具有异香、防虫蛀、不变色的特点。近代以来,天津的通草堆画以吕景猷的作品最佳。1914年、1915年,魏元泰的风箏和吕景猷的通草堆画被选中出国展出,参加了日本、美国的博览会并获奖。

民国时倡导民众从事手工艺劳作。当时,天津是新型教育和文博事业的基地,博物馆事业和艺术教育等均走在国内前列,由此也推动了工艺美术的创制,如出现了空竹艺术等;同时也有效提升了地毯、挂毯的质量和品位;而玉雕、抽纱刺绣、工艺制镜、加工珠宝首饰、制作金银摆件等则形成行业。

当代天津(1949年以来)——

民间工艺美术传承与创作面临发展良机

进入了一个调整、改革和发展的新时期,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也在相应调整。工艺美术和地毯两个工业公司已不复存在。许多身怀绝技的老艺人和工艺美术大师去世;许多传统工艺美术品种和技艺一度濒临失传和灭绝。面对新形势和新情况,迫切需要在历史新起点上,在继承和恢复传统的基础上,开创出一条加快推进和实现天津工艺美术行业创新发展的新路来。

在部分工艺美术企业面临困境的同时,天津的民间工艺美术创作和一些民营企业仍一派繁荣景象。20世纪末、21世纪初,民间产生的琢画、石绘、工艺毛猴、鱼羽画、刻瓷、微雕、泥娃娃、木偶、泥漫画、转土泥塑、戏偶、蜡像、烙画、内画壶、釉制葫芦等,不但各具特色,而且各有其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如出现在蓟县(今蓟州区)的转土泥塑,以其奇特的造型艺术博得专家的赞誉,作品甚至走出了国门。民营企业中亦有专门从事制作和经营门神、工艺扇等深受大众欢迎的工艺项目。特别是一大批城镇社区妇女开展的手工编织、刺绣、钩制、机织手绘、结艺等,颇具新意,不仅在国内外销售状况良好,而且出口远销。

本世纪以来,国家启动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为天津工艺美术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

2006年国家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天津市的杨柳青年画和泥塑(天津泥人张)被列入“民间美术”范围。在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中,天津市南开区的风箏制作技艺(天津风箏魏制作技艺)被列入“传统技艺”范围。在天津市公布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有杨柳青剪纸(西青区)、大郑剪纸(东丽区)、盛锡福毡礼帽制作技艺(和平区)、老美华津派旗袍制作技艺

在刺绣工艺方面,20世纪初,山东的抽纱刺绣工艺传入天津,形成了以女工家庭抽纱刺绣为特点的手工业生产。

在空竹艺术方面,民国时期众多的空竹品牌中,“刘海风葫芦”成为天津空竹的优秀代表,它的创始人是屈文台,所开的空竹作坊叫“修竹斋”。20世纪20年代,“刘海风葫芦”被杂技艺人王雨田搬上了吴桥杂技舞台。屈文台为杂技表演者特制了杂技表演专用风葫芦,从其平衡度、稳定性以及外观上都精工细作,实为“刘海风葫芦”之精品,深得杂技艺人的赞许。

1919年,天津福利架镜工厂在全国首家引进日本制镜技术,采用银镜反应电镀工艺生产镜片。20世纪30年代末,张振才等匠人在玻璃利器磨花的基础上创新形成了单面玻璃磨花工艺。由起初磨山水、花草发展到磨人物、鸟兽等多种造型。

珠宝首饰和银摆件的加工也有看点。19世纪中叶,天津出现了首饰生产作坊。20世纪40年代,靳继年将镏、阳、脱等篆刻工艺与搬打、花丝、镶嵌等多种工艺相结合,逐步形成了独具北方特色的银摆件制作流派,使天津银摆件跻身于全国四大流派之列。赵连斌博采中外首饰设计制作技术,制造的“手工刻花戒”被誉为天津银活一绝。

民国中后期,地毯、提花织物等产业受到损害,杨柳青木版水印花年画走向衰败。这些情况的产生,不仅源于新兴工业对手工艺产品的冲击和自身工艺的滞后,更有外敌对天津的经济掠夺和政治腐败、时局不稳等因素叠加造成的不良后果。

(和平区)、汇蛟源吉祥手布艺技艺(红桥区)、古铜(银)鍍金器修复及复制技艺(河西区)、津门蔡氏贡禅制作技艺(南开区)、刘海空竹制作技艺(南开区)、周记宫灯制作技艺(东丽区)、皮影雕刻技艺(蓟州区)、津派玉雕(红桥区)、麦秸画(津南区)、木版水印花艺(天津杨柳青画社)、葫芦葫芦制作技艺(河东区)、许氏戏曲盔头传统制作技艺(和平区)、鹰帽子(猎鹰防护罩)制作技艺(河北区)、家具制作技艺(许氏木匠手工制作技艺)(河北区)、曹子里绢花制作技艺(武清区)等。

各区县也申报了若干“传统技艺”。如西青区的杨柳青风箏、草编柳编技艺等。具有丰富民间工艺资源的宁河区(今宁河区),先后建立了木版年画、剪纸、木雕、根雕、葫芦雕、泥塑、手工制陶、芦绣等民间工艺传承示范基地。下辖的丰台镇、潘庄镇、板桥镇、七里海镇、芦台镇、造甲城镇先后被命名为天津市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区县级“非遗名录”的建立,不仅同样有助于工艺美术的传统代表作及制作技艺保留住、传下去,还有机会使其放射出新的光彩,创造出新的成果。

可以看出,天津工艺美术的发展历程,反映出的不仅有时代变迁的印记,也有地域文化的承继;不仅有民间艺人匠人的潜心创制,也渗入于城市经济发展带来的文化交融。当下的天津工艺美术领域,在抢救与挖掘,开发与创新等方面可谓生逢其时。特别是众多民间工艺美术的优秀技艺,已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政府和市场的关注和帮扶。加快推进天津工艺美术各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不仅有利于天津本地工艺美术的继承和发展,也有利于优秀的技艺和匠人获得更多创新机会与更广阔的提升空间。

(本版图片由作者提供)